



学科交叉与融合视角下中国边疆研究 文献计量分析的注意事项与遵循原则

朱 尖

摘要:近年来不少学者依托主流数据库,借助文献计量学、知识图谱等理论方法对我国边疆研究成果展开了系统分析。这种学科交叉研究方法,能够较为清晰地彰显我国边疆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有助于深化研究、助推学科发展,但也存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融合不足的问题,导致分析不准确、结论不客观。边疆问题研究的样本选择应避免片面化或单一化,关键词要尽可能地囊括边疆问题绝大多数;核心作者遴选,要在考虑发文量的同时兼顾影响力;核心刊物的确定应兼顾代表性集刊;边疆研究机构分专门和相关两种,特别要对一支队伍两块牌子的情况进行整合说明;研究成果的引文与被引,一定要进行清晰的界定与区分,且界定原则要统一;中国边疆研究的热点和前沿,虽存在一定的交集,但在分析总结时绝不能将二者模糊处理,乃至合二为一。

关键词:中国边疆研究;文献计量分析;交叉与融合;注意事项;遵循原则

DOI: 10.13734/j.cnki.1000-5315.2021.06.016

收稿日期:2021-06-01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中国边疆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朱尖,男,安徽萧县人,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汉唐东北史、边疆史与中国边疆学,E-mail:zhujian@cass.org.cn。

一 问题的提出

我国边疆研究历史悠久、传统优良、成果丰硕,有学者用“千年积累、百年探索、四十年实践”^①来概括其发展历程,其中“四十年实践”指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边疆研究。这一阶段是我国边疆研究的又一次热潮期,呈现出新的特点,实现了两个突破:一是由近代边界问题的狭窄范围,发展成了以中国古代疆域史、中国近代边界沿革史和中国边疆研究史三大研究系列为重点的研究格局;二是突破了史地研究的范围,将中国边疆历史与现状相结合,形成了成果众多、选题深化、贴近现实的特点^②。随着研究的深入,不同学科背景、不同研究方法、不同关注领域的学人,积极投身边疆研究的大潮中,边疆研究的学术队伍不断壮大,众多研究平台相继搭建,研究成果也大量产出,学术出版物、期刊论文、学位论文、会议论文等各类学术成果不断涌现,众多科研项目获批立项,推动了中国边疆研究的大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我国边疆研究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拓展,已经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和学科突破点,一个新兴的学科中国边疆学展现出了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巨大的发展潜力。这与习近平总书记 2016 年 5 月 17 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要求的“要加快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使这些学科研究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突破点”^③的精神高度一致。新时期,我国边疆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边疆的有效治理、安全稳定与持续发展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同时,我国周边关系和国际局势的复杂多变,也对边疆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国边疆研究在深化发展的同时,边疆研究的学科、学术和话语三大体系建设也迫在眉睫,这不仅仅是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及统筹边

① 马大正《中国边疆学构筑是当代中国学人的历史担当》,《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1 期,第 1—8 页。

② 马大正《关于构筑中国边疆学的断想》,《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 年第 3 期,第 12—15 页。

③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 年 5 月 17 日)》,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3 页。

疆安全和发展的现实需要。

新时代,学界开始系统总结和反思我国的边疆研究与学科发展,诸如王振刚对新时代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发展及反思^①,汪洪亮对更长时段即近代以来中国边疆学构筑进行的回顾与前瞻^②,同时许多学者也对边疆研究相关基础理论和未来发展问题展开了新的思考^③。在传统研究的同时,一些学者借助于文献计量学和知识图谱绘制等多学科的分析方法,依托中国知网(CNKI)、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CSSCI)、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数据库、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等数据,从成果和立项数据分析的角度,对我国边疆研究进行总结,并提出建议。早在2013年,唐超便以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边疆研究立项信息为对象,利用高频关键词构建“案例—属性”矩阵,并以此为基础借助SPSS软件进行因子、聚类、多维尺度分析,发现边疆研究领域的12个具体研究热点、7个研究范式和2个研究层面,为开展边疆研究奠定了基础^④。朱尖、苗威依托CSSCI数据库,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借助文献题录分析工具(SATD)、社会网络分析软件(Ucinet)及其内置可视化工具(NetDraw)对我国边疆研究论文的年产量、来源期刊、基金资助、作者队伍、研究机构、研究热点、经典文献等问题作了系统分析^⑤。杨琳亦基于文献计量法,对我国边疆问题研究论文展开了分析,涉及到论文数量、学术关注趋势、核心研究机构、核心作者、关键词共现、核心作者研究方向等内容^⑥。马元喜依据中国知网数据,借助CiteSpace软件,对中国边疆研究的前沿与热点分布及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⑦。张高原亦借助CiteSpace软件,依据CSSCI数据,对中国边疆研究的发展脉络、前沿热点、发展趋势等方面作了统计分析^⑧。

除了以上针对边疆研究成果进行的整体分析外,还有一些学者就某一研究方向或某一对象展开分析而取得的成果。首先,边疆治理研究最受关注。如曹李海、李月明分析了边疆治理研究的认知谱系与深层机理^⑨;马琳娜基于科学文献计量视角对中国边疆治理研究的发展态势作了分析与展望^⑩;王齐齐基于文献计量方法对边疆治理研究进展、前沿问题作了总结与展望^⑪;王家斌、荆蕙兰基于CNKI期刊数据对我国边疆治理研究的现状、热点与趋势进行的分析^⑫;等等。其次,是对专业期刊刊载文献进行梳理分析。如戴豫君、刘晖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2012年载文进行的统计与评介^⑬;朱尖、苗威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包括《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导报》)创刊至2013年所有刊载文献作的全面分析^⑭等。再次,是研究热点和前沿问题近年来颇受关注。如李大龙参考读秀学术搜索著作数据,并以中国知网检索论文为样

①王振刚《新时代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发展及反思》,《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第10—21页。

②汪洪亮《“问题”与“主义”之变奏:近代以来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回顾与前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4期,第1—14页。

③马大正《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一书对新中国以来边疆研究成果信息、中国边疆研究发展的演进历程和趋势、构筑中国边疆学的学术思考和当代边疆研究者的历史责任进行了全面的回顾与总结。为响应和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思想,推动新时代中国边疆学学科话语体系构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编辑部分别与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联合举办了“新时代中国边疆学学术讨论会”,主要围绕着“中国边疆研究的内涵和特征”、“中国边疆学学科话语体系建构”议题展开,部分研究成果已经发表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3期和2020年第1、2、4期上。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2期还组织刊发了“新世纪中国边疆研究回顾与展望”的学术总结论文。《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中国边疆学研究”栏目还刊发了“新文科背景下中国边疆学建设”专题专栏。此外,进入新时代,李国强、罗中枢、周伟洲、许建英、邢广程、马大正、李大龙、姚大力、林文勋、孙勇、孙宏年、吕文利、周平、方铁、冯建勇、吴楚克、高福顺、何明等学者也相继以专题论文的形式对中国边疆学基础理论和学科发展展开探讨,其中部分学者发表了多篇研究成果。

④唐超《我国边疆研究的热点与范式探析:以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立项信息为对象》,《武警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第5—9页。

⑤朱尖、苗威《中国边疆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第15—24页。

⑥杨琳《基于文献计量法的边疆问题研究》,《红河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第78—80页。

⑦马元喜《中国边疆研究的前沿热点分布及发展趋势分析——基于CNKI刊源(1999—2019)的文献计量统计》,《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第79—87页。

⑧张高原《近年来我国边疆研究发展脉络及理论前沿——基于CSSCI(1998—2018)的知识图谱分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第227—233页。

⑨曹李海、李月明《边疆治理研究的认知谱系与深层机理探究》,《实事求是》2018年第2期,第28—33页。

⑩马琳娜《中国边疆治理研究的发展态势分析及展望——基于科学文献计量视角》,《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第115—122页。

⑪王齐齐《边疆治理研究的文献计量考察:进展、前沿与展望》,《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第64—71页。

⑫王家斌、荆蕙兰《回顾与展望:我国边疆治理研究的现状、热点与趋势——基于CNKI期刊的文献计量分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第223—233页。

⑬戴豫君、刘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2012年载文统计与评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年第3期,第140—146页。

⑭朱尖、苗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现状分析——基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88—2013年)的计量统计》,《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年第3期,第163—179页。

本展开分析,其关注点主要是新时代中国边疆研究热点和前沿问题^①;朱尖借助中国知网数据,以研究成果的关键词分析为中心,对中国边疆研究的学术热点、特征与边疆内涵认知问题作了探讨^②。此外,还有个别关于学位论文的专门研究。如刘洋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中国边疆历史系2010—2020年学位论文为例,对相关学术论文的研究领域、热点问题、学术价值等特色进行了总结和展望^③。

以上基于主流数据库和相关对象,运用文献计量、知识图谱等研究方法,对中国边疆研究成果进行统计与分析,通过量化指标将目前的边疆研究进行直观展现,鉴于研究方法和数据样本的客观性,故所得出的认识和结论也较为清晰明了,能够相对明确我国边疆研究及其学科建设的整体状况和发展趋势,也为我国边疆研究成果的研究(学术史)拓展了全新的视角。需要注意的是,文献计量学和知识图谱等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在应用方面目前主要集中在情报学、图书馆学等领域,在其他学科的应用则主要体现在管理学、科技管理、医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在人文社科领域的应用时间并不长,鉴于数据库平台尚处在不断完善过程中,尽管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④,但尚未达到成熟的水平。对于中国边疆研究而言,当前相关文献计量分析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二者之间融合不足的问题,在具体研究中则表现为样本筛选不准确、过于依赖数据库和分析工具、统计数据错误以及对边疆研究现状掌握不全面而导致的分析不客观等问题,这不仅不利于研究深化和学科发展,而且也会误导读者。同时,还因一些作过重要贡献的学者和研究机构被忽略而显得评价不公正、不客观。笔者以为,边疆研究本身具有特殊性,涉及学科领域多样、研究内容丰富,在数据库选择、样本提取、数据分析和结论得出等方面皆不能只依赖于分析工具和数据库,同时也需要人工干预手段的介入,让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有效结合,才能得出相对客观、全面的认识。

当前我国的边疆研究处在深化发展时期,“中国边疆学”学科构建正在系统推进,边疆学学科、学术和话语三大体系建设尤为紧迫,因而运用文献计量和知识图谱展开边疆研究成果的统计与分析,就显得尤为必要。因为对研究成果的发表量和趋势、学术队伍与核心作者群体、研究机构和平台、核心期刊、研究热点、前沿问题、被引文献等的总结和分析,一定程度能够为边疆研究机构、研究者和潜在研究者提供一个快速了解和把握我国边疆研究现状的途径,也为相关职能部门的边疆问题判断和决策提供了依据,对新时期“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的构建起到一定的助推作用。正是因为此类研究的价值和重要性,未来随着边疆研究成果的增加和数据库的完善,相关文献计量分析文章一定还会不断发表。所以,下一步研究中一定要处理好研究方法交叉与研究对象融合的问题。下面,笔者主要基于学科交叉与融合的视角,就相关研究在样本选择、研究结论得出、关键问题分析等方面应当注意的事项和遵循的原则,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二 样本选择:“中国边疆研究成果”界定的注意事项

依据上文对目前已有边疆研究文献计量统计看,研究对象基本上是目前主流学术数据库收录边疆研究文献。相信在未来的研究中,研究对象的数据来源也不会离开这些数据库,只是研究对象的内涵和外延会拓展,除了对边疆研究成果的整体宏观分析外,还可能对边疆研究的某一个细化学科或某一研究领域进行中观或微观分析。那么,如何筛选样本,换句话说,确定哪些研究属于“边疆研究”的范畴,就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边疆研究是极其复杂的研究领域,涉及的学科门类多样、研究内容也极为丰富,无论是整体研究,还是某一细化学科领域的研究,都需要科学的界定;另一方面,样本选择是文献计量分析的前提,如果样本选择较窄或者较宽,都会影响到全文分析的准确性和客观性,都不能科学揭示学科发展趋势和规律,并可能会给研究带来不利因素乃至误导的不良后果。

哪些成果属于中国边疆研究成果范畴,的确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目前并没有明确的界定。有学者指出,边疆学的学科性质是“综合学科”,一是历史与现实的综合,二是理论研究、事实研究和战略研究的综合,三是多种学科的综合,而强调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是对其学科特征的表述,只能确定其研究方法的综合,没有表达出边疆学研究目标任务的综合性^⑤。正是边疆学学科的综合性和交叉性,使得其研究成果的内容和方法也较为综合复杂,这给样本筛选带来极大的困难。

①李大龙《新时代边疆学研究的热点与前沿问题》,《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第18—26页。

②朱尖《中国边疆研究学术热点、特征与边疆内涵认知——以研究成果的关键词分析为中心》,邢广程主编《中国边疆学》第13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70—83页。

③刘洋《近年来中国边疆研究学位论文的分析与展望——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中国边疆历史系2010—2020年学位论文为例》,邢广程主编《中国边疆学》第13辑,第324—342页。

④当前人文社科领域某一学科或研究方向的文献计量学分析成果越来越多,并且也出版了专题研究著作,如蒋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文献计量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⑤汪洪亮《“问题”与“主义”之变奏:近代以来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回顾与前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4期,第1—14页。

但是,前辈学者有关中国边疆和边疆学研究内涵和对象的分析,可以说为中国边疆研究成果的界定提供了基本遵循。马大正在对中国边疆界定的基础上指出:“边疆研究的对象是中国边疆,包括陆疆和海疆的历史和现状,可谓是上下五千年,东西南北中。中国边疆的发展不是孤立的,与统一多民族中国内地紧密相关,是相互补充,密不可分的,中国边疆的历史必须要和全国历史的发展,和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治边政策,和中国疆域形成和发展的进程结合起来。”^①众多学者在探讨中国边疆学学科构建的过程中,也较为直接地论述了学科研究内涵和对象问题。邢玉林在对中国边疆学学科名称概念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中国边疆学研究的对象,即以边疆地区及其硬系统(如社会结构、区划沿革、管理机构等)和软系统(如各项政策、政教措施、治边思想等)为研究客体^②。马大正根据中国边疆学的学科特点,指出中国边疆学内涵包括基础研究领域和应用研究领域,基础研究领域包括中国边疆理论、中国历代疆域、历代治边政策、边疆经济、边疆人口、边疆社会、边疆立法、边疆民族、边疆文化、边疆考古、边疆地理、边疆国际关系、边疆军事、边界变迁、边疆人物等诸多研究方面,应用研究领域则是在基础研究的基础上对当今及未来中国边疆发展与稳定的战略性、预测性的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其研究的范围也包括了边疆经济、边疆人口、边疆政治、边疆社会、边疆立法、边疆民族、边疆文化、边疆地理、边疆国际关系、边疆军事以及边疆自然和生态环境等诸多方面,其与基础研究领域的不同特点在于有更强的现实性^③。方铁指出,在研究领域方面,中国边疆学应涵盖以下内容:国内外边疆问题研究状况与相关的理论;中国边疆(包括陆疆、海疆与边界)形成与巩固的理论;中国疆域形成发展史与边疆研究史;中国边疆的民族史、移民史与人口史;边疆地区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变迁历史与现实方面的关系,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边疆地区人地关系的历史与现状;中国边疆与邻国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包括友好合作、对峙与争端、未来展望等方面的问题;历史上与现实生活中产生重要影响的边疆思想与治边政策;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历史与现实方面的问题;等等^④。李国强指出,中国边疆学就研究内容而言有两个重点方向:其一,以“中国历史疆域的法律地位”作为中国边疆历史和中国疆域理论研究的出发点,重点开展以羁縻政策、藩属制度为主的中国历代边疆治理与历史疆域形成发展的研究,同时将中国边疆研究置于世界各国边疆(或边界)研究之中,注重中国边疆与世界各国边疆、中国边疆研究与世界各国边疆研究的局部与全局关系,注重中国边疆研究的中外贯通和古今贯通,进而深入探索古代中国边疆的发展规律并构筑起相应的中国边疆理论体系;其二,以“当代中国边疆的稳定与发展”作为中国边疆现状研究的出发点,以中国边疆的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探讨 21 世纪新形势下中国边疆发展的规律^⑤。

综上所述,基本可以明确边疆研究的主要内容,宏观上看涉及到陆疆和海疆两大基础领域,包括历史和现状两大基本方向,微观上看又涉及疆域变迁、边疆治理、周边关系、边界问题、边疆发展等一系列边疆“形”和“态”的问题。笔者以为,我国的边疆研究应分为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所谓狭义,即上述探讨的陆疆和海疆及其衍生的边疆形与态的问题的研究;而所谓广义应该是在狭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包括历史上对疆域变迁和形塑起到促进作用的民族和民族政权,周边与中原互动过程中涉及到的疆域与边疆变迁的历史问题等的研究,还包括当今边疆稳定和边疆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以及周边关系、地缘政治、国际关系等系列问题的研究。

因此,在从事中国边疆研究文献计量分析时,如何筛选样本,就显得尤为复杂和重要。从目前来看,已有研究的统计分析对象都是狭义的边疆研究成果,还很难实现广义边疆研究成果的计量分析。但是,即便是狭义的边疆研究计量分析,其样本选择依然有很多问题需要注意。一方面,边疆整体研究中的样本选择,要避免单一化,否则得出的数据和结论自然会出现偏差。整体研究中的样本选择,不能仅仅依托一个关键词“边疆”进行检索。从上述的分析可知,整体边疆研究至少应该包括“疆域”、“陆疆”、“海疆”、“边界”、“治边”、“沿边”、“边境”、“周边关系”等关键词。因为疆域是边疆得以存在的基础,也是古今边疆研究的基本范畴;陆疆和海疆是边疆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虽然一些边疆研究成果已经包括了二者,但是有关海疆和陆疆的专题研究也是重要内容;边界问题,尤其是近代以来有关边界条约和边界争端与解决问题的研究,也是边疆研究的重要内容;治边则是边疆治理研究的简称,目前相关研究成果越来越多;沿边、边境是对外开放的前沿,边疆对外合作与交流的桥头堡,边疆的稳定与发展、中国的崛起与周边关系密切相连,沿边、边境与周边问题研究也是边疆研究的重要内容。只有将以上边疆问题的研究成果尽可能囊括进来,才能较为全面地彰显我国边疆研究的整体情况。另一方面,在具体学科和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文献计量分析中,也需要更为明确地界定关键词或者对其有清晰的说明。比如,在探讨边疆治理专题研究时,样本筛选的关键词应该包括边疆治理、治边、边疆政策、边疆思想、边疆

① 马大正《热点问题冷思考:中国边疆研究十讲》,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11 页。

② 邢玉林《中国边疆学及其研究的若干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 年第 1 期,第 4—16 页。

③ 马大正《关于构筑中国边疆学的断想》,《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 年第 3 期,第 12—15 页。

④ 方铁《论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 年第 2 期,第 1—9 页。

⑤ 李国强《中国边疆学学科构筑的透视》,《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5 期,第 6—11 页。

经略、边疆稳定、沿边合作(开放)、边疆发展等关键词,如果将外延稍微扩大一些的话,还应该包括藩属、宗藩、羁縻、朝贡、边界争端、周边关系等;在探讨海疆专题研究时,样本筛选关键词应该包括海疆、南海、东海、钓鱼岛、九段线、海洋权益、海洋史等关键词;在探讨边疆民族问题时,其样本筛选则更为复杂,边疆历史研究方面需要与民族史研究成果进行区分,边疆现状研究方面还需要与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成果进行区分。

在样本的筛选过程中,还需要注意一些不相关成果的剔除。由于数据库无法做到完全智能化,一些涉及到检索关键词的研究成果,可能内容并不是严格的边疆问题。比如在“边疆”关键词检索方面,会有一些基于边疆地区研究的金融、农牧业等研究成果,或其他学科使用的边疆词汇,但并不是传统的边疆研究,这些成果需要剔除;在海疆领域,也应该剔除一些涉及到海洋经济、养殖、勘探、物流等的研究成果。

三 中国边疆研究文献计量分析结果遵循原则

文献计量和知识图谱的统计和分析,分析结果基本是学科的作者群体(核心作者)以及学科成果的情报源(核心期刊)、研究机构、研究热点和研究前沿、引文和被引分析(经典文献)方面。对于中国边疆研究文献而言,这些结论的得出,都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一)核心作者的确定标准与准确性

核心作者指的是在边疆研究领域发文较多的作者,也可以认为是学术代表人物。一般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是独撰或第一作者,其二是整体分析(包括非第一作者)。在人文社科领域,合作研究的情况相对少一些,目前合作的情况多集中在一个单位内部或者导师和指导的研究生之间。为了统计的准确客观,应当取独撰作者或第一作者。

在文献计量学理论中,确定核心作者有专门的原则,即普赖斯定律(Price's Law)。该定律认为在同一主题中,全部论文的一半,由该领域中全部作者的平方根的那些人所撰。其推导的数学公式为: $M \approx 0.749(N_{\max})^{1/2}$,其中,M为核心作者最少的发文量, N_{\max} 是发文量最多者,0.749是常数^①。在边疆研究成果统计时,需要首先明确发文量最多者,进而代入计算公式,就能确定核心作者的最低发文量,发文量大于、等于核心作者最低发文量的作者就是核心作者。笔者认为,边疆研究具有跨学科性和复杂性,其研究成果和研究者相对分散,不具有高度集中性,这也就导致其核心作者群体的聚集性不强。仅仅依靠普赖斯定律这一标准确定的核心作者群,可能存在泛化情况,需要结合其他标准进一步细化。这里可以依托被引数据,从学者影响力角度作进一步筛选,将同时具备发文量和影响力的作者确定为核心作者。在筛选的过程中,还需要特别注意是否存在作者同名的情况。目前相关研究在核心作者确定方面,就存在数字不准确和标准不统一的问题。比如《近年来我国边疆研究发展脉络及理论前沿——基于CSSCI(1998—2018)的知识图谱分析》一文^②,按照其统计标准,在核心作者的统计中,落下了马大正、吴楚克等重要的作者。该文的检索关键字仅为“边疆”,这显然是不科学的。如果将检索关键词进一步扩大至上文所谈的“疆域”、“陆疆”、“海疆”、“边界”、“治边”、“沿边”、“边境”、“周边关系”等范围,笔者按照论文5篇以上的标准进行初步统计,发现至少还应包括(按照姓氏笔画排序)于逢春、厉声、邢广程、吕文利、吕朝辉、朱金春、孙保全、李大龙、李国强、李金明、李庚伦、李鸿宾、杨天宏、杨明洪、张世明、张健、陆韧、陈征平、林文勋、罗群、周伟洲、周智生、姜贵品、黄达远、章永俊、管彦波这26位学者。此外,该文在影响力作者统计方面,除了提到当代的学者外,还涉及近代费孝通、吴文藻、顾颉刚三位学者的贡献以及国外学者拉铁摩尔学术著作的影响,指出这些学者的研究“对于后世的中国边疆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被广泛引用”,这就产生了混淆,导致高被引作者与高产作者情况不能形成比较和呼应,存在标准不统一的问题。该文研究是基于CSSCI(1998—2018)期刊数据,为什么会这个时间以外的学者和成果类型?对于这一问题,作者并没有交待。笔者理解的是,该文的被引指的并不是CSSCI(1998—2018)收录的学术论文被引,而是“边疆”这一关键词涉及的研究领域被引,这就涉及到样本的引文内容。

需要强调的是,无论依托何种数据库、何种统计标准,样本选择和核心作者的确定及排序,一定要做到尽可能准确,因为这涉及到学者们的学术贡献问题,是学术评价的重要指标,对核心作者本人也尤为重要。此外,必要时,可以将核心作者的年龄、职称和单位等情况一并统计,从而更大程度地把握核心作者群体的状况。当然,作者的职称和单位问题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比如文章所属作者职称变化存在滞后性、作者单位存在不同阶段的变动性等,这些都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二)核心期刊的确定

期刊是文献计量学中文献情报源的一种,核心期刊指的是学术成果发表的主要学术刊物。这里的“核心”,并非学术

①王崇德《文献计量学引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2—164页。

②张高原《近年来我国边疆研究发展脉络及理论前沿——基于CSSCI(1998—2018)的知识图谱分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第227—233页。

评价体系中的核心期刊,而是统计分析对象中的载文量靠前的期刊。根据目前国内学术数据库特点,收录期刊类型有以下两种主要情况:一是中国知网的全文收录,基本上涵盖了目前国内所有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包括人文社科研究的普通期刊、北大核心期刊、CSSCI来源期刊、学术集刊等;二是人文社科专门的学术数据库收录期刊,包括CSSCI收录期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来源期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收录期刊。目前,人文社科研究领域相关统计分析主要依托中国知网、CSSCI数据库和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数据库数据。

核心期刊的确定依据的是布拉德福定律(Bradford's Law),即“对于某一主题而言,将科学期刊按着刊登相关论文减少的顺序排列时,可以划分出对该主题最有贡献的核心区,以及含有与区域论文数量相同的几个区域”^①。对于我国边疆研究而言,专业学术期刊目前只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个别期刊开设了边疆学研究专栏或者较多刊载边疆主题的研究文献,如《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思想战线》、《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云南行政学院学报》、《云南社会科学》、《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但整体上看,与其他成熟学科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所以,刊发边疆研究部分成果的期刊,其分布呈集中特征。如果只依托布拉德福定律进行分区的话,会存在核心期刊只有几种,不能较好彰显边疆研究的期刊分布状况。因此,对这一情况就应当进行一定说明,并且可以将发文量达到某一数值的期刊纳入核心期刊范畴。

此外,《中国边疆学》、《中国边疆民族研究》、《西南边疆民族研究》、《边疆考古研究》、《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华西北疆评论》等学术集刊皆大量刊载边疆研究成果,未来在对边疆研究成果进行统计分析时,不能忽略了这一部分学术出版物所发表的边疆研究成果,并应将这些集刊纳入核心期刊的考察范畴。

(三)研究机构的明确与整合

研究机构,指的是从事相关研究的学术平台,主要以文献署名单位体现。边疆研究的学术机构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专门研究机构,即研究机构直接冠以“边疆”类名头,这类机构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民族政治与边疆治理研究院,云南师范大学中国西南对外开放与边疆安全研究中心,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四川师范大学华西北疆研究所,兰州大学中国边疆安全研究中心,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浙江师范大学环东海与边疆研究院,厦门大学南海研究院,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东亚关系与边疆问题研究中心、中国边疆学研究中心,塔里木大学非传统安全与边疆民族发展研究院等;一种是将边疆问题作为其主要研究方向的学术机构,主要有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历史与档案学院,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历史文化学院,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厦门大学历史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文学院,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等等。

边疆研究机构的确定,主要依据发文量的多少,可以确定一个最低数值,然后进行整体排序。对边疆研究机构发文量统计时,需要注意几个问题。其一是边疆研究机构在不同历史时期存在名称变化的情况。如中国边疆研究所,在此前称之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2014年变更为现名;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是2015年学校校内机构调整后新设立的一个学院,由原人文学院历史系和公共管理学院情报与档案学系合并组建而成。其二是边疆研究机构存在一支队伍、两块牌子的情况,一些专门研究机构属于非实体单位,基本挂在二级学院之下。这种情况比较多,这里不再举例说明。以上两种情况,要求我们在确定边疆主要研究机构时,一定要进行人工整合说明。如果仅仅依托数据库和提取工具,得出的结果肯定存在偏差。

(四)引文与被引的区别和作用

引文,指的是一篇文章作者所引证的文献,即参考文献。对期刊引文的统计分析,可以更快速有效理解和掌握相关研究的情况,对评价一篇文章质量和一个学术期刊的办刊水平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被引,指的是研究文献被后续研究引证或引用的情况,分为两种:一是数据库某一学科或研究领域被引文献,以CSSCI来源数据库为例,其数据库被引文献指的是被CSSCI来源期刊论文引用较多的关于该学科或研究领域的研究文献;二是研究过程中所选择的样本被引情况。通过被引的统计,可以有效评价某学者、某研究成果、某学术期刊的价值和影响力。引文和被引也是总结某学科或研究领域经典文献、核心期刊、核心作者的一个途径。

^①王崇德《文献计量学教程》,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6页。

就中国边疆研究而言,在统计分析过程中,无论是借助引文还是被引数据,一定要进行清晰的界定和区分。比如用引文数据确定经典文献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边疆史地的原始古籍和学术著作,用引文数据确定核心期刊时,则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同时期的边疆学术刊物;用数据库被引界定经典文献,可能主要是一些边疆研究学术著作,用数据库被引界定期刊,则可能会出现样本之外的期刊类型。这些问题在分析过程中都需要进行必要的说明,否则读者很难作出清晰的判断,并易对读者产生误导。

(五)研究热点与前沿问题的确定及二者的区别和联系

研究热点和前沿问题是文献计量分析中重要的研究内容,通过研究热点的总结,可以明确已有研究的主要关注领域,而对前沿问题的分析,则能够为未来深化研究指明方向。研究的热点问题和前沿问题,二者虽存在一些交集,但绝不是相同的概念,在进行学术总结时,不能将二者模糊处理,乃至合二为一。

研究的热点和前沿问题的确定,都是依托关键词的统计分析而得出的。研究热点主要运用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法,即某一关键词如果在多篇文献中同时出现,而且与其他词汇共现的频率较高,就可以认为该词所代表的是本领域的研究热点^①。研究前沿主要是依据关键词突现技术加以实现,突现词是指短时间内在文献中频次变化率较高或者出现次数较多的词,可以根据突现词的相应变化,对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与演化趋势作出相应的判断^②。无论是热点关键词共现,还是前沿的关键词突现,得出的只是热点和前沿的关键词组,还需要进行进一步总结。

就中国边疆研究而言,中国边疆研究的热点和前沿有着明显的区别。李大龙指出:“如果说多数学者给予关注的问题可以视其为研究热点的话,那么前沿问题则应该是研究中难点问题的聚焦,而难点问题的研究则是少数学者倾力的方向,代表着边疆研究前沿。”^③所以,在关键词统计的基础上,对我国边疆研究热点和前沿问题进行分析时,一定要将二者进行明确的界定和区分。

关于边疆研究热点问题,笔者以往的研究统计主要集中在西南边疆、边疆治理、西北边疆、边疆民族关系、边疆(史地)研究、边疆稳定、中国边疆学、边疆政策等领域^④。通过近年研究的发展,笔者进一步统计,将近500个高频关键词进行聚类整合,大概集中在12大领域,即边疆治理、边疆关注主要时段、边疆史地与热点专题、边疆民族关系与民族国家认同、边疆涉及国家(区域)与国际关系、边疆地区与区域边疆、边疆稳定与发展、边疆重点地区、边疆理论与学科构建、海疆、边疆人物、边疆其他^⑤。但是,边疆研究的前沿问题,并不是这些热点问题,而是需要在高频关键词基础上进行系统总结分析。关于这一问题,前辈学者已经有所考虑。邢广程在《关于中国边疆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中首先分析了我国边疆地区的新形势与边疆研究的新要求,进而从中国边疆研究视野的拓展、将“建设海洋强国”作为中国边疆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加强对我国边疆长治久安问题的深入研究、加强对边疆地区发展问题的研究、加强对我国边疆地区与周边关系的研究、研究“一国两制”的成功经验促进中国统一大业、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依然是中国边疆学的核心内容和重要研究领域等八个方面,指出我国边疆研究需要关注的方向^⑥。李大龙《新时代边疆学研究的热点与前沿问题》一文则对边疆研究前沿问题进行了专门探讨,将其总结为中国边疆话语体系建设、多民族中国形成与发展的理论解构、“东亚天下秩序”的理论解构、中国海疆的形成与发展、治边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建设等六大方面^⑦。笔者以为,邢广程八个方面的分析和阐释,可以认为是新形势下我国边疆研究的前沿问题;李大龙六大方面的具体分析,可以认为是中国边疆研究传统的前沿问题。我们在对边疆研究前沿问题进行总结分析时,应该在高频关键词突现基础上,将这些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研究成果和认识吸收到分析中来,以便得出更为全面的认识与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中国边疆研究成果文献计量分析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原则和标准的确定上,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未能实现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的有机结合。需要明确的是,文献计量学方法、分析工具和数据库只是为中国边疆研究成果文献的分析提供了便利手段,并不能提供准确的判断和总结,无论是样本的筛选,还是核心作者、期刊、研究机构、引文与被引的明确,研究热点与前沿问题的总结分析,都离不开研究者对研究现状和学术史的整体把握,否则很难得出准确

① 赵荣英、李飞《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的国内外信息计量比较研究》,《情报科学》2013年第2期,第7—12页。

② Chaomei Chen et al., “Emerging Trends in Regenerative Medicine: A Scientometric Analysis in CiteSpace,” *Expert Opinions on Biological Therapy* 12, no. 5 (March 2012): 593-608.

③ 李大龙《新时代边疆学研究的热点与前沿问题》,《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第18—26页。

④ 朱尖、苗威《中国边疆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第15—24页。

⑤ 朱尖《中国边疆研究学术热点、特征与边疆内涵认知——以研究成果的关键词分析为中心》,邢广程主编《中国边疆学》第13辑,第70—86页。

⑥ 邢广程《关于中国边疆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年第4期,第3—16页。

⑦ 李大龙《新时代边疆学研究的热点与前沿问题》,《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第18—26页。

判断和客观结论。开展人文社科的文献计量研究,一定要注意方法和对象的“交叉”问题,不仅仅是二者的简单结合,更需要有效融合。对于研究者而言,一方面要善于利用已有数据库资源,掌握使用数据统计方法和工具,另一方面还要对研究现状乃至学科发展趋势有系统的了解和把握,二者缺一不可。

Points for Attention and Principles for Bibliometric Analysis of Chinese Borderland Stu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disciplinary Intersection and Integration

ZHU Jian

(Institute of Chinese Borderland Studies, CAS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research results of Chinese borderland studies have been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based on mainstream databases and bibliometrics, knowledge graphs and other theoretical methods. This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method shows the statu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Chinese borderland studies, and helps to deepen research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disciplines. Nevertheless, insufficient integration of research methods and research objects leads to less accurate analysis or objective conclusions. This article believes that the selection of samples for borderland research should avoid one-sidedness or simplification, keywords should cover the main borderland issues as much as possible, core author selection should take the amount and influence of one's of publication into account, representative collections should be included beside core journals, the borderl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should include both specialized and related ones, with particular integration and explanation of the situation of one institute with two names, citations of research results must be clearly defined and distinguished with unified principles, and the hotspots and research frontier should be clarified and not combined into one.

Key words: Chinese borderland study; bibliometric analysis; cross and fusion; matters needing attention; follow principles

[责任编辑:凌兴珍]